

第三十四期 語絲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寄啓明

穆木天

啓明兄

蒙寄來語絲多份，謝謝。近多無聊，亂七八糟的繙了一陣，不知怎的竟注目在錢玄同先生的大作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上，我又可笑，我又可怕，我真沒有想到錢玄同先生竟把我們的「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主張誤解到那種田地！立刻，我想起了法國詩人 Alfred de Vigny 的詩橄欖山 Lemont des Oliviers 中的一句話來

— Helasi je parle encore, que de ja ma parole

Est tournee en Poison dans chaque parole, (Dela. grave 版維尼詩集 234

頁底段二三行)

耶穌的這句話的「苦味」我似乎是實證出來。民衆的誤解自是難免。那想到堂堂的錢玄同先生——中國的學術界的泰斗錢玄同先生，竟把我們小學生們的話誤解到這般的利

害！真的「謎」(enigma)呀！竟把我們的「國民文學」的主張與「愛國論者」同人的所說看成一致了！可謂天荒已破，善為「玄同」，妙哉！妙哉！錢先生尚如此誤解，社會更不知誤解到什麼地方了！確是「poison」了！經過錢先生這番的誤解，社會更不知又藉錢先生的明覺越法誤解到什麼的地方！確是「毒」了！果如鳳舉所說：「不中說話！」

國民文學的思潮，怎能與「歐化」相矛盾！怎能與東西文化調和不相怎容！與世界主義相反對！怎能與個人主義相背馳！他們是一個東西的多面相，錢先生怎麼把這麼膚淺的東西都誤解到這樣利害！一邊「歐化」是得肯定的，一方「國民的」(national)之分子是尤得肯定的。兩方面同時同等的肯定，才能結果出真的調和。Influence 是外來的，而 Orignal 是內面的，自己的，國民的。我們的「國民文學」的主張，根據在「個性」上，國民主義是自「我進化」的一形式，在與 individualism, Cosmopolitanism 成正的比例：國民主義的實現越法的澈底，個人主義是越法的深刻，世界主義是越法的堅固。我們所說的「國民文學」，就是我所愛的 Romanisme français 的一分子 (factor) 的「國民文學」的意義在此論點我與鄭伯奇兄一致的，不過我還肯定 Maurice Barres 的一部主張，而伯奇兄說「尙早」。我主張「歐化」與「國民化」共進，而伯奇兄主張「歐化」更要特別注重。藉「歐化」助長「國民化」的。老實說：中國現在少的是真正的中國人與真正的歐化者。真正的中國人才能是真正的歐化者；是一個人的兩面的人格。中國要求內能發現自我而外能吸收世界的人。中國的人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家奴」——國故說者：一種是「洋奴」——假的時髦。都是奴才，全非主子：所以他們也不懂得中國，亦不懂世界。國內年來「反射的」(reflective) 彩色太大，到處是假的東西，

本日期錄

- | | |
|---------|------------|
| 寄啓明 | 穆木天 |
| 答木天 | 周作人 |
| 寄木天 | 張彥瑛 |
| 敬答穆木天先生 | 錢玄同 |
| 寬容之難 | 陶孟和
周作人 |

或此爲因，真堪痛恨。在我們的愚想，當然得從倡國民文學，發現出國民的日我，同時才能吸收真的歐化來，才能有真的調和，才能作出真的越法澈底的自我來，才能作出真的時代來。現在中國的傾向不是「歐化」，確是「擬歐」。所以得喚起已死了百千年的國民精神作堅牢的土台。這一點小意思，不知錢先生以爲如何？錢先生怕把 National me 解成什麼「用夏變夷」，「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東西去了！所以才說提倡「國民文學」是痛恨「洋鬼子」。不知是否？不敢「邪推」這似乎也不能怪錢玄同先生。就他的論調看，他確像一個老實 (majime) 的人。他怕一輩子不能懂 Paradoxe, ironisme, Cynisme 一流的東西。他把我的文學的字句就沒有看懂。他的讀法，確是「歐化」了，確是科學的，是數學的，是物理的。形式的文法上，他確是沒有錯誤；但在內容的方面！我的詩中的「他們的時代思潮」的「他們」的前詞怕是錢玄同先生未找出來。我用的「頑固」的意義，錢先生却又像完全未看懂。真好眼力，「不偏不黨，不同不合，用自己的自我力，來發揮個性——國民的方面，外吸收世界潮流，要有判斷，要不肯從」，才是我所謂「頑固」的 Signification 的大部呢。不知錢先生以爲是也？我的詩裏有：「我們要歌誦盤古的開天，我們要歌誦軒轅的

治世，我們要歌誦烏江夜裏的項羽，我們要歌誦努力實現的仲尼」；錢先生兩眼怕完全注意在「盤古，軒轅，項羽，仲尼」上，把「象徵的功用」完全忘了，他沒有看見「開天」「治世」「努力實現」，「烏江夜裏」。大概是從小讀留侯讀項羽了，一見仲尼即想起了尊孔，妙哉！妙哉！錢先生在文章上就未看解，所以還給我，創造出一個「誇」字來！多謝！多謝！所以以先生恭維我們說我們要復活「國故」了！我們真不敢受這種讚美，不勞多譽。

錢先生像什麼都不要了！不但是國民文學，鄉土藝術，什麼什麼有中國字樣的東西都想要了。我們不知道錢先生爲什麼研究中國的學術呢？中國的文字：中國的言語，連中國的國民都不要了。不知錢先生還要什麼？究竟錢先生反對「國民文學」的論點安在，有什麼根據！我要請教了！「孺子不可教也」，請錢先生可不要說。

「復活祖宗的言語」，這個命題的動機，還是數年前在京都沈尹默先生給我們的。啓明兄，記得一天沈先生問我們說：「中國把自己已有的好東西完全扔掉，去費無益的精力去找反到不及舊的新的同樣的東西，未免太不經濟了。我們吸收古典中好好的東西，我們接待前人的足跡往前去創造。」尹默先生這種「新古典」的思想，我是永遠感服的。所以我們想我

們的話有限，我們的字彙是不夠用，我們效仿法國「七星同人」(Les Septiers) 的以智。要盡力去作新字，其中之一即是利用古來原有的好字；當然，創造新的言語，是不僅限復古古語的。這方面想尹默先生還能有好的特別充足的解釋。

最後，爲免誤會，要再贅一言聲明：國民文學的「國民」的字樣，是特徵的一面，不是用以抹殺全體的。特別單肯定這一面的原因，特別單提倡這一面的原因，是因中國的人們把他否定了，忘掉了。嘿！最妙了！特別是「愛國論者」「國故論者」「復古論者」尤其把「國民的」方面忘去了。National 的方面，錢先生把他否定了，到與「愛國論者」不謀而同了。

國內的思想界真不了！斯界的權威錢先生，還這般的「玄同」，其影響不問可知了！亂七八糟說了這些個冒昧的話。我希望你能同尹默先生，及鳳舉、耀辰兩兄看過，能在語絲上發表，否則還我。因爲這樣的誤解下去，不了！不了！

祝近安。 穆木天。五月十三日午後。

答木天

周作人

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論國民文學的信，我覺

得對於你們的意見能夠充分了解。傳道者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想這本來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過是民族主義思想之意識地發現到文學上來罷了。這個主張的理由明若觀火，一國的文學如不是國民的，那應當如何，難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遺老的麼？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為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 (Asiatic) 中之漢人，拚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或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為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國人裏面外國人太多，西崽氣與家奴氣太重，國民的自覺太沒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獨立，學術文藝上也受了影響，沒有新的氣像。國民文學的呼聲可以說是這種墮落民族的一針興奮劑，雖然效果如何不能預知，總之是適當的辦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

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這樣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於別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于自己的墮落。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鏟除自己的惡根性，這纔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拳匪的排外思想我並不以為對絕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有人相信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謫，這很令我懷憂，恐正常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于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
我們要闡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號上，今重錄于此，因為現在我的意見還只是這樣。我不知怎地很為遺傳學說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

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儘量地研究介紹今古的文化，讓牠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 (Gualavo le Bon) 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窳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裏註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於一切提唱不免有點冷淡了。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只在能狗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釐，所以這倒也是無妨無妨。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周作人。

寄木天

張定璜

木天兄：

錢玄同先生的文章令你憤慨，引起了你的一篇答辯。我還沒完全知道你答辯的些什麼。對於那個大概錢先生也還有話說。我現在只想悄悄的講幾句。

你的見解若是表白清楚了。我相信我可以懂，不消說他一定可以懂。但前回你所寫的確實有些惹起誤會的地方。你知道，我們都在這

裏談說話的不容易。有的朋友並以爲最好是一句話加上一句以上的註解，才或者可以幸免于罪。這並不是說我們比人家高明，只有人家錯解我們，沒有我們錯解人家。況且喜劇是人生很可寶貴的一件東西，所以無論是我錯解你或是你錯解我，究竟都是有趣的事情。

你說你無意提倡愛國論，我也那麼樣想。然而讀你們主張國民文學的文字時，我便不敢那麼樣想了。中國人對於中國據我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第一人稱的態度。凡是我的或我們的都是好的，而且愈古的愈好。譬如說我們的指甲是好的，而且蓄的愈久的愈好；能殼去背上抓癢固好，然而究竟不及彎出來一尺多，可以戴上黃綾套子的更爲可貴。我們的養身法是好的，而且時代愈早的愈好；能殼在太陽地裏捫錢已經算不壞，上乘的便是辟穀。另外一種是第三人稱的態度。什麼事情都是他或他們怎麼怎麼樣。他們都是用外國文教的，所以我們也用外國文教。他們的頭髮是皺的，所以我們的也得燙皺來。這兩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我們沒有什麼法子可以分出一個高下。我想告訴你的只是，照你那篇「我們要怎樣辦我們的這個知我們的那個」式的詩歌看去，你實免不掉有那第一種態度的嫌疑。你雖說你不是提倡愛國論，你却不知道像你那樣的口吻講這樣愛國那樣愛國的多着呢。他們

一箇腦兒就只知道嚷愛國。爲什麼嚷？「因爲給人家打了，受人家欺負了。」爲什麼給人家打了，受人家欺負了？「那除非非老老知道」至于說是大家來想一想罷，看應該怎樣就可以使得自己強勇，使得自己聰明，不至于挨人家打，被人家欺侮，不但不至于挨人家打，被人家欺侮，而且可以使得誰也不挨誰打，誰也不敢欺侮誰；這樣的想，既費心血，又傷腦力，是人們不大樂意幹的。因此他們的本領也只是嚷嚷罷了。外國人有嶄新的鎗砲，究竟比起公氣裏的呼聲強得多，所以今日的侮辱還是加上了昨日的侮辱，並不因爲他們的嚷嚷而減少一忽忽。

你所謂國民文學若是說中國不會有 Shakespeare, 猶如英國不會有王實甫，中國不會有 Madame Bovary 猶如法國不會有紅樓夢，我滿心贊成，若是說大家要關起門來讀中國書，然後造出一種國民文學來，我則以爲多事，縱使我不反對。中國人向來就是關起門來讀中國書的，結果成爲過去的那些文藝。我相信那裏面有過一個美麗的境界。然而那個境界畢竟是過了。後來的人只是幽囚在死骨的牢獄裏，沒有感覺，沒有情思，沒有生命。中國文學現在唯一的生機就在于拆毀幾千年來腐的藩鎖閉着他的藩籬，盡量去和別種文學接觸。等到不但 Boccaccio, Rabelais, Cervantes 等都有了忠實的全譯，而且 Iliad 和 Odyssey 也有了介

紹的專家，那時候自然有真正的再生的中國文學出來，那時候，如果你我都健在，而你如果又還高興講國民文學，我就可以告訴你，這便是我們的國民文學。那時候我的理由就是，人是本是地的兒女。藝術和生活一樣，無論如何想擺脫，總是那地方生長的，總擺脫不盡那地方裏的土氣。更不消說土氣不同，培養出來的花果一定也不同，只要花能殼薰香，果能殼新鮮，誰還惡這個土氣幹嗎呢？人生不是幾個公式，幾條定理，幾隻名詞所能概括無餘的東西。不能殼把他概括無餘而硬想把他概括無餘的看過去似是古貌照「人的學者道德家和神徒，其實不外是自我狂或死囚或活屍。小時候我常聽見人家說：「你幹嗎老瞧我？我臉上有什麼好瞧的？不同是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麼？」當時經人家這麼一說，我也就不敢再瞧了。如今想來，假使人生下來真個是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真件件東西都是一樣，那多沒意思！且莫說別的，我先將不認識誰是穆木天，誰是鄭伯奇，誰是錢玄同，誰是沈尹默，誰是周作人，誰是徐祖正，誰是——張定璜！我們大家在路上碰見時，在電車裏對面坐着時，在神田舊書店裏撞頭時，在開明門口並排立着等候梅蘭芳的風采時，我們都將覺得似曾相識，似非相識，將想招呼，又不敢招呼，將要說聲 shiba-taku 而又忍住，好像是久不見怎麼樣？的安

一點，但終于彼此一句話沒有說，白白地兩下錯過。不但如此，我們將把生人認作熟友，拉他到家裏來預備候他一杯自己搖的冰忌(絞?)。凌。他自然也將和我們一樣的困惑，疑糊，躊躇，末了總算決了心跟我們來，進了門口，這才知道又弄錯了，剛要轉身折回；然而已經來不及，我們家的劉媽前天從口外帶來的一匹四尺來長三尺來高的黃狼狗冷不防的突然從門背後穿了出來，「嗥」的一聲，早嚇得他魂飛魄散，夢似的抱頭鼠竄而去！同樣，我們自己，——你想想，我們自己！——也難免，也必定，要遭這種的厄運。我們將喪失我們的信實，我們的友誼，我們的情愛，我們的美，我們一切恃以自豪的東西。

幸而人生並不如此，幸而我們並不同是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

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我們固不能有，但多樣的橫眼睛直鼻孔，我們也不能造。我們既沒法子造出我們自己的臉龐來，我們也就沒法子去造出我們的國民文學。

而且國民文學這個話就令在別國的文學史上有人講過，就令沒有一切的語病，我也覺得後來有人愛講時可以講講，現在的我們還談不到。所謂國民文學當然不但要有所指，並且要有所別，譬如別于非國民文學之類。現在連文學還沒有產生出來，那裏來的國民的或非國民

的文學呢？

張定璜，一九二五，五月二十日。

敬答穆木天先生

錢玄同

穆先生底信雖然是寫給啓明的，但全信底話都是爲我而發，所以這篇底題目叫做『敬答穆木天先生』。

穆先生信中對於我用了不少的俏皮字眼和語句，乃至以我底名字爲戲，這些我都不介意，而且覺得有趣。惟有一處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因爲這太叫我難受了，便是『堂堂的錢玄同先生——中國的學術界的泰斗錢玄同先生』這個稱號。魯迅說得好：『……如果開首稱我爲什麼『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纔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爲『與衆不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猛進第五期通信)。「堂堂的」底醜相何等肉麻！『泰斗』究竟一個銅子几可以買幾斤！玄同雖不學，尚不願以此自污！

開話表過且談正文。

我敬告穆先生：我是否日本所謂『出』一流的，我自己不知道；可是穆先生給鄭伯奇先生那封詩體的信(二月六日京報副刊)，我的的確確是『完全未看懂』，我底『真好眼力』是這樣，我也沒法。——但我也還不甘心

安于『真好眼力』，我今天把京報副刊上所載穆先生底信檢出來，再逐字逐句地細讀一過，還是『完全未看懂』，大概我實在是『一輩子不能懂諷刺一流東西』了。

不但此也，穆先生今回給啓明的信，我尤其看它不懂。穆先生給鄭先生的信中有『我們要歌誦盤古的開天，軒轅的治世，烏江夜裏的項羽，努力實現的仲尼』等語，又引孔老二『關雎樂而不淫』這句話，我認爲這是鳳舉所說的『凡是我的或我們的都是好的』底意思，固然是『完全未看懂』，但我自己覺得這還不失爲『望文生訓』。至于今回的信中，說了許多『國民文學』。『國民的』，而又力言與『愛國論者』不同，也不是要『復活國故』，我不知道這『國民的』既非歷史上底故物，到是什麼東西？若說把現代世界文化(即所謂歐化)普及到中國來，換言之，便是中國亦沐浴于世界文化之中，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謂『全盤承受歐化』，這是我所極端主張的，但這決不能說是『國民的』，因爲既非咱們所固有，亦非咱們所獨有。我看穆先生底語氣，他所謂『國民的』，決非此指而言，可以不論。據我底猜想，穆先生大概與郭沫若先生底見解相像。郭先生最愛把自己底理想裝在古人底屍體上，如女媧，伯夷，叔齊，孔老二，聶政，王昭君，卓文君，王實甫，王陽明這些人底屍體，都是

被他利用過的。這個方法，「自己言之」，即所謂「託古改制」是也。用此法來做詩歌，小說，戲曲，則可；因為這不過是借用幾個古人名子，等于杜撰孫行者，林黛玉，杜少卿，多九公這些假名字，這不過是借用幾件古事，等于完全虛講事實（我底偏見，則以為杜撰名字與虛構事實，比借古人古事更好）。若竟認為實事，以為這幾個古人的確如此高明，再把它放大，普及。說古凡人都是如此高明，便認為咱們有如此的好祖宗，真是榮耀得很，為子孫者理合歌詠先德，發揮光大，這便不然了；因為這種「民族魂」是幾個文學家開了房門，用幻想造出來的，並非「我們民族歷史」是真這樣，真有這回事。所以假使我猜得不錯，穆先生確是「要歌誦」這樣的「國民的」，我實期以為為不可。——但穆先生的話，我往往是「完全未看懂」，上邊所說，不過是瞎猜而已。

盤古和軒轅下面底各兩個字，項羽和仲尼上面底各四個字，倒未曾「沒有看見」。不過我雖看見這十二個字，我並不覺得有了它們便可以抬高那四個人底聲價；我尤其不覺得這四個人有了這種高聲價，便能封到中國民族底全體。我是一個死心眼兒的人，我只會說呆話：盤古和軒轅這兩個人，根本上就不能信他們為有，故「開天」與「治世」只是胡說。項

羽和仲尼，固有其人。但「烏江夜渡」何以值得稱讚，我也不能了解（即使確是值得稱讚，這不過是他一個人底好精神了，也不能封給中國民族全體了）。至于「努力實現」四個字，我實不懂，即使「望文生訓」似乎也裝不到孔老二底身上，我知道他自己說過，「學也，祿在其中矣。」

以上固然是呆話，但若以「發掘我們民族的真髓」為職志，似乎總應該考察咱們民族底真相，未可錯認一己底理想為民族底真髓而一味去歌誦它吧！

穆先生說：「愛國論者，國故論者，復古論者，尤其把「國民的」方面忘去了。」我與這班什麼「論者」立于根本反對底地位（雖然穆先生說「到與愛國論者不謀而同」），沒有替他們辯護底義務。不過我總覺得他們並沒有忘記「國民的」，他們對於中國民族一切朽腐的文化，殘酷的道德，污穢的生活，謬誤的學術，都有相當的讚美。他們最不願意中國人「舍己從人」。他們常說，「甲點是中國的比外國的好，乙點是外國的比中國的壞，丙點是外國的也沒得比中國的好，……」

那個「誇」字倒不是我「創造」的，是鄭伯奇先生創造的，就在鄭先生復穆先生信中「具體點說」底第三層：「我們要追懷古代的光榮。我們要誇我們民族歷史的真實呀！……」

如黃河岸上的無限的沉沙。」所以穆先生應該向鄭先生說多謝！多謝！」才對。（我這篇文章裏所謂「國民文學底主張者」，本兼指穆鄭兩先生的言，引鄭先生的，除「誇」字外，尚有「復活精美的古文古語」一語。）

我平常有一個偏見：我以為甲國歷史上有絕大意義的事實，並非乙丙丁……諸國也必須有的。現在看到鳳舉信中「國民文學這個話就令在別國的文學史上有人講過，就令沒有一切的語病，我也覺得後來有人愛講時可以講講，現在的我們還談不到」這幾句話，又把我這偏見引起來了。我以為別國縱使曾經積極地提倡過國民文學，咱們並不因此而亦須提倡，或者咱們竟是不應該提倡它也不說定。——因此，又想起一件事來了。西洋史上有 *Parisianism* (Parisianism) 一件大事，近來的中國人覺得咱們中國也非得要這麼一套不可。我底偏見，却認為咱們完全沒有這個必要，而且咱們不應該再要這一套；咱們應該將過去的本國舊文化「連根拔去」，將現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盤承受」，才是正辦。穆先生說我「像什麼都不要了」，這確是我底真意。我堅決地相信社會是進化的，人們是應該循進化之軌道而前進的，應該努力前進，決不反顧，才對。所以我認為過去的各國文化，不問其為中國的，歐洲的，印度的，日本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應該棄

之若棄敝屣。我對於它們，只有充分厭惡之心，絕無絲毫留戀之想。

我寫「敬答穆木天先生」寫到這里，却要自相矛盾了，我忍不住要對穆先生暫時不敬一下子了。穆先生忽然說出這樣幾句話來：「我們不知道錢先生爲什麼還研究中國的學術呢？中國的文字，中國的言語，連中國的國民都不要了。不知道錢先生還要什麼？」這幾句話，真是出我「意表之外」！我真不懂，穆先生何以忽然說出這樣幾句糊塗話來！難道研究中國底學術，是等於崇拜中國底學術嗎？難道不要國民文學，是等於不要國民嗎？真是奇談！我老實告訴穆先生吧：我是一個中年的學究，快到「四十見惡」之年了。在十年以前，我確是崇拜中國底學術的。但「中國底學術」這個名詞太廣泛了，其中包含許許多多相反的分分子，我們當崇拜它時，便在中間分出「正」與「偽」，「雅」與「俗」來，只捧住那自己認爲「正」或「雅」的「拳拳服膺」，那認爲「偽」或「俗」的便一脚踢開。拿文學做個例，我那時只要文選樂府詩集等書，而不要元曲選紅樓夢等書。這不僅我一人如此，大概舊時代的人研究中國底學術都是這樣的。十年以來，我受了許多益友——如吳稚暉，胡適之，顧頡剛，魯迅，周啓明等——底教訓，才大悟前非，知道研究中國底學術等于解剖屍體，就解

剖而言，目的在求知該屍體底生理和病理，所以無論腦袋和生殖器，食道和糞門，白喉和梅毒，好肉和爛瘡，都是研究底好資料，應該一律重視。若就屍體而言，它本是一個腐爛了的廢物，萬萬沒有把它放在活人堆裏，與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國底學術和「發揚民族魂」是相反的；我贊同「整理國故」而反對「宣揚國光」。至于現在的中國國民，我從沒有說過「不要他們」的話，但我希望他們「革面洗心」努力追求歐化，根本反對他們再來承襲咱們祖宗那種倒霉的遺產。所以我雖想要「國民」！却不要「國民文學」。

尹默是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對於舊詩是極深造有得的，他常有娓娓清言，不獨令人忘倦，而且耐人尋味，我一向戲稱他爲「世說新語中人」。我們倆底交情是極好的，但一見面總要吵嘴，他有許多見解，我和他是永遠說不到一起的。穆先生引他在京都時說的那段話，那時他也曾把這意思寫信給國內的幾個朋友（我也在內），啓明曾把那封信中重要的話引在自己的園地裏：「……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祇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頁二十二）尹默這個見解，與穆先生所謂「利用古來原有的好字」一

層，我有部分的同意。我底偏見是這樣：無論古·今·中·外·文·話·雅·俗的語言文字都是死的。只要咱們會利用就都是活的。「劉郎不敢題「糕」字」的見解，方苞所謂「佛氏語·宋五子講學口語·魏晉六經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不可入文」之說，固然不通；即胡適之分別「死語」「活語」，亦殊拘滯。我則以爲做文章用字，應該絕對自由：曰若稽古，奉天承運，嘉謨嘉猷，乃怪乃神，蠶迪極押，宵寐匪禎，且夫……，嘗謂……，有……之必要，得……之，王八蛋，放狗屁，媽拉巴子，像殺有……事，……（場合），……（面倒臭），……（inspiration），……（enthusiasia me），……都不過是表示某個意義的符號，咱們做文章都可以拿來自由利用，不受絲毫拘束。我對於過去的文章最愛元曲，因爲他們敢于自由用字；我對於現今的文章最愛吳稚暉先生底，因爲他敢于自由用字（吳先生有一篇亂談幾句，登在猛造第十期上，述他自己做那樣自由文章的見解，我以爲他底見解是狠對的）。總之我因爲主張用字自由，所以對於「前人留下的綾羅綢緞」，「古來原有的字」，認爲咱們都有利用它的權利，這是我同意于沈穆兩先生的。但認爲「好」不好却不在字底本身上，應看咱們怎樣用法而定；——還有，即使「好」，

『這也好』而已，並非『除此以外別無好，非用這個不可』。

以上都是述說我底偏見，並非與穆先生辨駁。我相信兩個人底思想不會完全相同，正如兩個人底臉孔不會絲毫無二一般，所以全無一致之可能。我又相信辨駁底結果，不過多打了幾場筆墨官司而已，決沒有一方面會屈服的。我和穆先生，見解相去如此其遠，當然不會走到一條路上來的，——其實不走一條路，那才有意思；我讀了鳳舉信中論『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一段，更感到不走一條路的好。

一九二五，六，二八。

寬容之難

啓明先生：

讀了大作『黑背心』，非常欣悅。迫害是世界人類的通病，一種普遍的罪惡，我恐怕很難——或者是永遠不能——汰除的。各時代迫害的方法不同的不過是所迫害的對象與迫害的方法不同罷了。西洋近代文明在大體上或者可以說是寬容的精神，但是同時他的迫害的精神或者也一樣的有力。一直到現在，外國人到美國上岸之先，必須在紙上正式聲明自己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紅色者在各國的受脅迫與切支丹宗門之在十七世紀之日本者何異。而反對紅色者在俄國所受的迫害的程度也

不見輕減。宗教思想的寬容或者可以希望慢慢的有進步——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美國有幾州的教育界上連這個也竟不許——至於政治思想的寬容，大概在今日之國家制度，政府制度繼續存在的時候，永遠是不能得到的。

以上都是閒話。先生所說關於清朝排斥異端的歷史，我想起在十幾年前讀過的一本外國著作，或者可供參政。著者是荷蘭萊頓大學中國文教授德胡魯特 (De Groot)。書名中國之異端與迫害 (Sectarianism and Persecution in China)，此書曾印在普魯士王家學院報告中，約二百頁，以後曾否印有單行本，不得而知。他所取的材料、有歷史，上諭，告示，材料倒極豐富。不過我當時因為德胡魯特是一個基督教徒，覺得他對於中國的態度，特如在他的大著作『中國宗教系統』裏所表示的態度，非常使中國人讀了生厭；一種潛意識的國家主義的情操使我憤懣，特別因為這部書是暴露我們的短處的。所以我始終沒有大注意他。先生如果注意這個問題，何不看看他的著作到底還公正不？此書印行的年月，現已忘記，我所讀的是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藏本。

但是我想若託英國專賣東方書籍的店

家，或者還可以買到的。德胡魯特的中國學問在西洋一般的中國學者中算最好的，祇可惜他的基督教徒的氣燄，與鄙視中國的態度，中國讀者很難容忍。

孟和先生：

手書敬悉。德胡魯特的書當很有用，唯此

刻恐不容易找到罷。我的懶惰的希望是有專門家出來編著這樣一部漢文的書，不但于我利便，我相信就是於中國思想改革上也有許多的益處。寬容或者永久只是一個理想，即使不是空想。大抵人都是感情用事，理知不大有什麼力量。中國人據說是缺少熱狂，其實也不盡然，我覺得他所缺的倒是冷靜的理性。雖然他有一種冷酷與麻木之德，但是別一件事。宗教思想的寬容是沒有的，政治思想的寬容是更沒有的了，近來如梁任公先生的被稱為國賊，將被驅逐出京，胡適之先生的被宣告將一處先生以極刑，都是最新的實例。至于道德思想的寬容尤其不會有了，舒新城先生在成都高師因與女生通信，被教員校長公呈督軍派兵協同學生到處搜捕，上海的記者，這實在足以代表中國新舊上下各方面的態度了。我感謝民國因為他給我兩件好處，一可以不垂辮髮，二可以不避諱。但是，我後來纔知道，豁免了避一家的廟諱，同時却變了將敬道許多多的廟諱了。我們的常說一句話，包不定違反了那一個皇帝王爺的旨意，他便會落！論來辦我們。我並不是說去了木頭土換了鸚鵡皇帝。不過這樣地到處見皇上的態度是極不愉快的事。或者只要自己也取皇上的態度，那就沒有什麼了，只是，在我們是做不來的罷了。六月二十日，作人白。